

## 揭发批判“四人帮” 在批邓斗争中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罪行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 侯赞民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这是无产阶级反击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

“四人帮”罪恶滔天，罄竹难书。今天我代表师大党委和复旦党委，在这里着重揭发批判“四人帮”在批邓斗争中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罪行。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场重大斗争，毛主席和党中央对这场斗争的性质、目的、意义、方针和政策都作了一系列明确的指示。但是，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公然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另搞一套，大搞阴谋诡计，私立秘密联络点，私整中央负责同志的黑“材料”，到处插手，煽风点火，企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对“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必须彻底清算！

“四人帮”对抗毛主席关于批邓的指示，  
破坏党中央的战略部署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同意的华国锋同志在今年二月打招呼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揭发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时，“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注意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毛主席说，错了的，中央负责。政治局认为，主要是邓小平同志负责。”这一指示，明确规定了批邓斗争的方针、政策。

“四人帮”阴一套，阳一套，表面上拥护毛主席的指示和华国锋同志的部署，背后却大搞阴谋诡计，另搞一套。在北京，他们抓住清华、北大，通过两校指挥全国，

跟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唱对台戏。在上海，马、徐、王紧跟“四人帮”，也抓了两校，以复旦、师大为窗口，南北呼应，紧密配合，打着批邓的幌子，大刮要在中央揪出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地方层层揪“邓小平的代理人”的妖风，妄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领导同志，以达到他们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去年十一月，清华大学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当时中央还没有部署在全国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徐景贤从“四人帮”那里得到消息，就在十一月三十日（星期天）找了师大、复旦进行布置，要两校当天晚上马上出一批大字报，并说可以点清华大学刘冰和教育部长的名。十二月三日，徐景贤又说：“教育界的人不能只是看到教育界这块天地”，“要想得深一点”。什么叫“想得深一点”？对这个问题，朱永嘉讲得更加露骨，他在今年一月五日召开的一次工农兵学员座谈会上说：“右倾翻案风既然是一股风，就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对这场斗争的性质、意义一定要搞清楚，你们有没有想到，这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在这里，徐景贤、朱永嘉的矛头所向是非常清楚的。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发了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的中央一号文件的当天，张春桥在北京写下了反党的二月三日《有感》，三月份，徐景贤和朱永嘉一唱一和，用极其刻毒的语言疯狂攻击华国锋同志。徐景贤恶毒地攻击说：“不一定是水平最高的人、最好的人当第一把手。”很明显，徐景贤的这些黑话是明目张胆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华国锋主席。同时，这也是对“四人帮”的无耻吹捧，它实际上是把“四人帮”说成是“水平最高的人”和“最好的人”。徐景贤还恶毒攻击诬蔑叶剑英同志说：“好多政治谣言就是从军委扩大会议之后刮起来的。”对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他们也都进行了恶毒攻击。看，他们大谈什么“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其罪恶目的，就是妄图在中央揪出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大批领导同志说成是“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统统打倒，而由“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与此同时，他们还层层揪“邓小平的代理人”。王洪文亲自打电话给徐景贤，狂叫：“要点一批部老爷的名。”王秀珍跟着叫喊：刮右倾翻案风时，“中央各部都没有顶住，只有文化部顶得住，是独养儿子。”徐景贤、朱永嘉还一再叫嚣：“中央的部署是一条战线一条战线地搞”，“要四面开花”。很清楚，他们打着批邓的幌子，自成体系，另搞一套，就是妄图把全国各条战线都搞乱，让“四面八方”都变成“四人帮”的“帮天下”。他们口口声声叫嚷“跟邓小平对着干”，实际上是跟毛主席、党中央对着干。他们厚颜无耻地把自己打扮成“批邓英雄”，而他们的所作所为，恰恰证明了他们是破坏毛主席战略部署的罪魁祸首。

## 二、“四人帮”疯狂整理、印发黑“材料”， 企图打倒一大批中央领导同志

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四人帮”及马、徐、王大搞阴谋诡计，施展特务手段，大量收集、整理和印发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

去年十二月，在全市党员干部会议上，马、徐、王奉“四人帮”的黑旨意，公开号召收集黑“材料”。会议期间，有个分配在国家建委工作的工农兵学员到上海出差，讲到国务院领导同志在科学院汇报会上的插话，徐景贤听到了这个消息后，欣喜若狂，马上派人去搞，硬是从那位同志的笔记本上抄录下来，匆匆忙忙印发。当时，有的同志提出：这材料上有那么多副总理的名字，这样印好不好？徐景贤竟胆大包天地说：“如实反映嘛！可以印发。”今年一月三十一日，朱永嘉先是打电话给复旦党委，后来又亲自跑到复旦，布置理科各系参加中央有关部召开的专业科技会议的教师，把国务院和各部负责同志在这些会议上的讲话整理出来，要上报，要批判。朱永嘉还借找函授教师和假期归来的工农学员谈话、开座谈会为名，收集外地的情报，并自己窜到江苏、安徽、江西等省收集黑“材料”。他们这种卑劣的行径，正如毛主席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时指出的：他们“或者无中生有，当面造谣；或者抓住若干表面现象，攻击事情的本质；或者吹捧一部分人，攻击一部分人；或者借题发挥，‘冲破一些缺口’”。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以及马、徐、王不择手段地收集黑“材料”，大搞阴谋诡计，比胡风反革命集团，有过之而无不及！

马、徐、王，不仅到处收集黑“材料”，并且私自将一些黑“材料”大量印发基层，强令群众批判。张春桥曾亲自打电话给马天水下达黑指示说：“材料可以印，不要以市委的名义，要以基层的名义。”既然要组织群众批判，为什么又不敢用市委的名义？这清楚地说明了他们做贼心虚，心中有鬼，说明他们是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马、徐、王秉承“四人帮”的旨意，把黑“材料”分到基层，大量印发。为了掩人耳目，徐景贤心怀鬼胎地说：翻印时，“不要一个版本，版本越多越好，让人家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这种鬼鬼祟祟的做法，哪里有一星一点共产党人的气味？！今年一月份，徐景贤通过歪门邪道，从江西弄到一份×××同志的传达十二省会议的讲话材料，马上派人跑到复旦大学，要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打印出来，并要我们连夜通知全市各高校和文教系统各局党委，第二天一早到复旦拿材料。我们当时问：“这材料是小道，还是大道？”他说：“不要怕，是大道的。”他们并且要我们转告各单位，这些材料我们已发到班组。意思是叫人家也去翻印，发到班组。马、徐、王还从福建弄到了一份没有正式定稿的“工业十八条”，立即印发到基层，叫群众批判。在市委党员干部会议上，他们把通过非法手段弄来的十几种黑“材料”作为会议文件印发到会同志，

组织批判。“四人帮”和马、徐、王，就是施展这种鬼蜮伎俩，把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散发至各个基层单位，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这种明目张胆的分裂行为，这种耍阴谋、搞诡计的手段，是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恩格斯曾经指出：“手段的卑鄙正好证明了目的的卑鄙”。“四人帮”以及马、徐、王，一无真理，二无群众，他们要篡党夺权，只得不择手段，大搞阴谋诡计。但是，他们表演得越充分，失败得也就越快越惨。

广大干部和群众对“四人帮”以及马、徐、王的这种罪恶行径，早就看在眼里，恨在心头。当时，许多同志就尖锐地指出，这种做法不符合“三要三不要”的原则，纷纷责问：这些材料是哪里来的？马、徐、王对此怕得要命，恨得要死，亲自出马，压制群众，气焰十分嚣张。一月八日，徐景贤窜到复旦，在学员座谈会上说什么：“×××的讲话材料，人家都发到公社，传达到群众了。人家对我们封锁，我们现在印发，怎么不行呢？这是反封锁！”真是强词夺理，竭力为自己的罪行辩护。科学院的那份点了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名的材料，我们开始没有印发，徐景贤便横加指责，说：“你们太谨慎了！”“四人帮”和马、徐、王那么肆无忌惮地大整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那么迫不及待地要点中央领导同志的名，完全反映出了他们要篡党夺权的急切心情。

### 三、“四人帮”到处插手，煽风点火，大搞非法串连， 妄图把兄弟省市搞乱

毛主席指出：“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主要是党的领导”。华国锋同志在中央打招呼会议上，也强调指出：“整个运动要根据毛主席指示，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但是，“四人帮”和马、徐、王却猖狂反对毛主席和华主席的指示，大搞非法串连。张春桥亲自把清华、北大大字报寄给马、徐、王，徐景贤立即下令复旦、师大转抄贴出，大量翻印，还布置说：“以工宣队团部的名义转抄，工宣队牌子硬。”他们还要我们两校组织一批合乎他们意图的大字报，然后在各种大小会议上，布置工厂、企业、机关、学校的干部群众来看大字报，进行大串连。徐景贤还要我们大量印发大字报选编，送给外单位。马天水并且鼓吹说：“让部队的同志到大学去受教育”。在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会议上，马、徐、王别有用心地把驻沪部队的同志和大学编在一起，妄图用大串连冲击部队。在“四人帮”和马、徐、王煽动下，当时到师大、复旦看大字报的每天就有几万人，从早到晚，络绎不绝。据统计，先后到上海师大看大字报的有一百多万人次，到复旦看大字报的有五十多万人次。很多同志提出：外单位来校看大字报，不是串连吗？马天水狡辩说：“这不是串连，这是交流经验。”什么交流经验？！这是彻头彻尾的、有计划、有

组织的反革命煽动。

马、徐、王还通过大串连,把黑手伸向兄弟省市,煽风点火,破坏兄弟省市的运动。按照“四人帮”的旨意,马、徐、王到处嚷嚷:“现在拥护邓小平那一套的人蛮多”,“有些省自己陷进去了,现在弯子不好转,弄弄就弄到自己头上了。”他们并且捏造“××省办了三万人的学习班,整派性,找后台,查地盘,把县委书记关在木笼里,脚都肿了;××省把造反派、新干部全都打下去了。”用这些谣言蛊惑人心。今年年初,马、徐、王在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会议上印发了一封从江西寄来的匿名信,信中恶毒攻击江西省委,诬蔑江西“省以下的组织大权基本上落在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顽固派手里”,说江西人民怎样受“迫害”,说他左手写信是“害怕当权派报复”等等。马、徐、王把这封信当成打击兄弟省市领导同志的重磅炮弹,一面把这封信在上海印发,一面又把它上报“四人帮”。“四人帮”见到这封信,也是如获至宝,江青亲自布置,找到了那个写信的人,怂恿他去破坏江西的运动。事实说明,马、徐、王是紧跟“四人帮”,破坏兄弟省市运动的政治扒手!

为了插手兄弟省市的运动,“四人帮”和马、徐、王还到处拉拢一些人到上海看大字报,进行串连。先后到师大、复旦串连的有江西、浙江、山东、江苏、安徽等省的一些干部。仅江苏一个省,先后到复旦大学串连、看大字报的就有九千多人,去师大的人还要多。对外地来的一些头面人物,马、徐、王还亲自接见,进行密谈。江西的××听了马、徐、王的煽动和到复旦、师大看了大字报之后,说:“鼓舞很大,你们的大字报说出了我们的心声,我这次到北京去告状,回来时再来看。”这个人回去之后,就大搞分裂,企图打倒省委领导同志。

张春桥及马、徐、王多次强调上海不能搞乱,但同时他们又千方百计要把兄弟省市搞乱。他们这种“稳住上海,搞乱外地”的反革命策略,严重破坏了兄弟省市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好形势,给国计民生带来极其严重的损害。而“四人帮”却不顾人民死活,还是疯狂叫嚷“没有乱够”。直到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以后,十月八日,徐景贤一面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一面还打电话到福建,找人进行反革命串连,妄图负隅顽抗。

“四人帮”和马、徐、王为了把他们在复旦、师大另搞一套的作法推到全市和全国去,不惜动用一切宣传工具,连篇累牍地进行报道,又是拍电影,又是拍电视,忙得不可开交。今年一月,《解放日报》记者写了一篇师大的报道,徐景贤亲自修改,姚文元亲自定题,让新华社发到全国,在各报头版头条刊登。见报的当天,徐景贤还亲自赶到师大,大谈姚文元改稿定题的“重要意义”,极力吹捧“四人帮”。今年七月,徐景贤指使《文汇报》连续三天在头版报道复旦的所谓批邓经验,继续利用师大、复旦两个“窗口”,为他们批邓另搞一套大造舆论。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马、徐、王在另搞一套闹得特别凶的时候，还专门组织了上海各高校的外国专家和留学生到复旦看大字报。他们这样做的罪恶目的，就是企图扩大“四人帮”的政治影响，把“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舆论造到国际上去！

“四人帮”和马、徐、王经常吹嘘自己是“一贯正确”的“左派”。恩格斯说：“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四人帮”的所作所为充分证明，他们决不是“一贯正确”，而是一贯搞资本主义、搞修正主义的老手！他们决不是什么“左派”，他们中有的是老投降派，有的是新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是一伙道道地地的极右派！是罪大恶极的反动派！对“四人帮”及马、徐、王的累累罪行，我们一定要彻底清算！我们两个大学的领导，在“四人帮”及马、徐、王的影响下，在批邓斗争中，也说了些错话，做了些错事，我们一定要和“四人帮”彻底划清界限，我们一定要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在市委的领导下，彻底揭发、深刻批判“四人帮”及马、徐、王的滔天罪行，把粉碎“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

---

上海市区、县、局党员负责干部会议秘书组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印发

---

(共印 530,000 份)